

# 产业结构调整与微观基础强化

## ——苏南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研究

吴志华 王家新

**摘要:** 本文以 20 世纪 80、90 年代苏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为主线, 分析了不同微观基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 不以微观基础强化作为前提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难以持久的, 不以微观基础强化与利用作为前提的结构合理化是低效的, 即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不可能在微观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形成。为此一个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内容是实行以企业改制为其重要内容的微观基础强化。

**关键词:** 微观基础 结构调整 逻辑顺序

### 一、微观基础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根据现有产业结构状况与事先确定的发展目标, 输入某种信号和能量, 引起结构新状态的作用过程。其基本内容有二: 一是市场上出现一些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信号与能量; 二是现代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能对调整信号与能量做出积极反应, 产生良好效果。与结构调整相联系的微观基础, 就是指经济主体(企业)对调整信号所作反应的强弱,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由一个个企业素质为基础所形成的产业素质。影响微观基础的因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产业制度或企业制度。由于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基本制度是财产约束硬化的产业制度, 一般企业都具有安全获取最大盈利的强烈欲望与相应能力, 因此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不管是传统的英美体系的产业结构理论,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新兴的法国产业经济结构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假定——企业对产业调整信号愿意并能够做出积极反应。

由于中国很多企业实施的是一种财产约束软化的产业制度或不很完善的财产约束硬化的产业制度, 相对西方企业来讲, 具有利益边界模糊、利益约束软化等特点, 因此除了要一般产业结构理论, 如产业结构评价、演进趋势、优化模式与方法以及产业政策、政府干预等进行借鉴与适应性研究外, 还必须对事实上比这些内容更重要的微观基础进行充分的关注, 以形成基于微观基础强化为前提基础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践机制。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来说, 政策的力量毕竟是一种需通过较高素质的微观基础而发生作用的外部力量。如果微观基础薄弱, 缺乏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那么再完美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也会失效。因为: (1) 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承受力。产业结构调整在理论上有两种方式, 一是主要通过注入增量资产来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二是通过调整存量资产并与优良增量资产相结合来调整产业结构。由于在一定时期出现的全新兴产业毕竟是少数, 因此产业结构转换的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改变原有产业之间的关联来实现的。由于这一过程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 且在一开始必然会带来某些供求关系与供求渠道的无序状态, 因此如果企业没有一定的承受力, 就会在调整中败北; 或者会因没有承受力的企业众多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2) 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主动适应性。政府出于某种

新兴产业的迅速拓展与原有产业的高级化, 会采取一些重点扶持的政策; 政府出于缓解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急剧变化, 会采取一些保护、保障或疏导的措施。但大多数企业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即使受政府扶持与保护的企业, 也面临着尽快提高产品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问题。为此, 不管那类企业都必须通过创新来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否则, 就会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强烈的磨擦, 或在政府不得已的保护中求得眼前的苟安与长远的被动(丧失了很重要的能力锻炼)。以下苏南——苏州市(苏)、无锡市(锡)、常州市(常)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 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二、强化微观基础: 苏南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选择

#### (一) 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苏、锡、常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区, 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中, 尽管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 5~9% 的速度, 但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彻底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 1978-1993 年的 15 年间, 苏、锡、常三市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翻了 4.46 倍。其中 1993 比上年增长的幅度竟高达 51.7% (周海乐, 1994)。连续高速增长, 使苏南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但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超常波动、效益下滑与结构失衡等负面现象。1975-1993 年, 苏南国内生产总值(GDP) 经历了 4 次大的波动, 且波动的周期越来越短, 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最高波峰与最低波谷竟相差 2.2 倍。从投资效益看, 1992 年苏、锡、常乡镇以上独立核算工业的百元资金利税额仅为 1980 年的 27.7%。到 1991 年, 苏南三市的第二产业比重分别达到 62.62%、68.8% 和 64.21%。与此同时, 第一产业比重虽然大幅度下降, 已低于省内与国内许多中型城市与个别大城市如重庆, 却大大高于京、津、沪、穗, 苏、锡、常三市分别比上海高出 11.32%、4.96% 和 1.83%; 第三产业比重滞后愈显严重, 在国内 41 个城市中, 苏南三市分别位列 32、31 和 37 位, 只相当于位居首位的广州指标值的 48%、48.31% 和 43.16% (周海乐, 1994)。下面的苏南产业结构变化图也很清晰地反映了 1993 年以前苏南地区第一产业下降幅度不快, 第二产业在波动中居高不下, 第三产业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来讲增幅不大等情况(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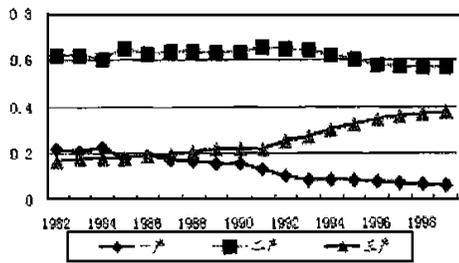


图1 苏南产业结构变化图

说明: 该图根据《江苏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与2000年《江苏统计年鉴》中苏、锡、常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计算、处理而成。

## (二) 外向带动与内企萎缩

1993年中央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以后,苏南经济增速减弱,并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适应症,如缺乏技术创新所对应的人财物要素、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低层次竞争、企业创新不足与活力不强等。而与此同时,南方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已经快速发展,颇具规模,广东、浙江等地的私营经济已呈现出强盛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情况下,苏南地区充分利用已经具有的较好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加大外贸出口与全方位开发境外资源的力度,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的经济带动战略。经过多年的外向型发展,在苏南区域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外资已不容置疑地成为主导经济,并相继形成了“以开发区为载体、外资企业为主力军,高新技术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特色。以苏州为例,199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中,三资企业占了37%;在全社会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了在全市的69%;全市完成的自营出口中,外资占了74%。全市生产六大支柱产业重点产品的企业中,三资企业占了110家,占这类企业的55%,特别是新兴支柱产业的生产企业,大部分聚集在各级重点开发区内。与此同时,该地区在不断巩固、提高农业基础的同时,牢牢把握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这条工作主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由于苏南在这段时期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致使公有企业的改革艰难,“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与外贸出口和外资利用直接相关的内资企业萎缩,进而使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放慢。主要表现为:(1)经过前些年与外商合资、合作的筛选,剩下的内资企业大都历史包袱沉重,发展不尽如意,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据苏州市国资局提供,截至1998年底,苏州市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773家,资产总额为365亿元,负债总额247亿元,账面净资产118亿元,其中中国有资产102亿元。全部国有企业净资产账面平均利润率为-1%。(2)拥有自主适应高新技术产品少,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市125种高新技术产品中,由外资企业开发生产的占68%。(3)与浙江、上海等地相比,苏南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明显落后,发展活力不足,总量规模不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到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幅降到了10%以下,其中苏州和常州两市的利润额出现了负增长。苏州历来是中国丝绸纺织服装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体制观念和投入机制方面的原因,全市丝绸纺织服装业相继出现了行业性亏损,而相隔不远的浙江绍兴市1999年全市纺织服装业的销售收入和利税却分别高达408亿元与32.4亿元。(4)内资企业的外向配套能力欠佳,无法满足外资企业就地就近寻找协作伙伴的需求。据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会提供,在苏州市14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中(不含常熟农业开发区),9个开发区内的内外资协作配套项目还处于基本空白状态,只有5个开发区中

的175家外资企业与苏州市134家内资企业建立了配套协作关系。这对于目前开发区内已有2100多家外资企业的数字而言,确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苏南地区这样一种“外强内弱”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资本经济结构及其变动影响的特性,从而使该地区社会稳定与区域经济安全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隐患。

## (三) 企业改制与方式变化

客观地讲,苏南地区对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权关系不明晰、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等问题的认识还是早的,并借邓小平南巡的春风进行了以“抓一块、转达一块、放一块”为重要内容的改革试点。但由于当时许多理论、思想是否尚未澄清,又背上“苏南模式”的包袱,因此产权改革设想没有得到全面付诸实践,点上成功经验也没得到总结推广。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才使该地区得以深刻反省十分普遍的“红帽子”或假集体、公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素质普遍下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问题,并坚定有力地进行企业改制。到1999年底,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实现改制的乡镇企业已占总数的95%以上。改制使产权关系日趋明确,企业投资主体迅速多元化,企业活力得到了释放。并大大促进了以打破传统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为重要内容的企业内部改革力度,使加快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开发性调整与增收节支工作落实到了实处。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制使苏南企业很快走出了困境,并创造出了投入总量并未增长但销售额与利税增长的可喜局面。1999年,苏南乡镇企业共创造销售收入3620多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12.17%;工业增加值达976亿元,比上年增长12.74%;利税237亿元,增长15.9%。现在,尝到了改制甜头的苏南各地纷纷加大改革力度,实行以集体股转让为其基本内容的二次改制,如张家港要求除宏宝集团等17家市场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骨干企业留有少量集体股份外,其余乡镇企业的集体股份原则上都要全部退出。

企业改制也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管理方式的变化。产权制度变革以前,苏南乡镇企业每年的资金投入至少上百亿元,其中用于建厂房、买汽车占了很大比重,而真正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不到一半。改制后,各企业都把目光紧紧盯在技术改造上,工业投入的70%用于设备改造、技术引进和新产品开发;设备投资中用于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的比重达到7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锡山、江阴、常熟、张家港、武进等市,科技进步在工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已超过了50%;苏州市乡镇企业中,属于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销售收入已占总收入的37%。苏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革,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股无形的冲击波。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改革的新形势。1996年以来,苏、锡、常三市政府部门竞相提出调整工作思路的主张,强调把属于企业的一切权力彻底干净地还给企业,包括企业的用工权、干部的任免权、企业的投资权、营销权、分配权等等,这些权力,过去一直是牢牢地抓在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手里的,并出现了许多像吴江市横扇镇这样“无为而治”的先进典型。

企业改制与有关经济管理方式的变化使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做出的关于“抓好第三次发展机遇,对经济结构实施全面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在苏南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具体请参见图1。从图1中不难看出,1996年后苏南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均呈明显下降之势,而第三产业则明显攀升。

## (四) 农户衰落与结构调整

乡镇企业转制与个体经济的崛起,使得建立在强大集体

经济基础上的苏南“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工补农”政策形同虚设,突然失去了政府与集体依靠的农户越来越感于千变万化的市场,难以以主体身份适应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主要表现为:(1)一家一户土地占有和生产规模极度小型化使得生产经营过于分散与农业生产要素难以流转,从而严重地影响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常进度;(2)长期以来过度的“统”使得苏南农民没有能像在集体经济不很强大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广东和山东农民那样在生产经营与结构调整中表现出真正的自主能力;(3)自合作化以来靠惯了政府与集体的苏南农民,在政府推动、集体包办的范围与程度大为减弱之后而显得极不适应,在对外交往中没有也难以取得平等的谈判权,因而多数时候农民是受害者;(4)农户因不很了解科技与市场信息、不熟悉新品种和新技术而难以主动考虑技术革新与新产品开发,通常只能沿着老路往前走或按政府部门的具体部署而机械操作,其结果是要么难以调整,要么就因一轰而上而造成产品严重滞销。为此如何通过农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引导农民创建自己的联合经济组织,就成了使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良好对接的关键举措,与此同时也是巩固农业适应性调整(可理解为市场较长时间疲软情况下的被动行为)成果、顺利实现农业战略性调整的重中之重。

### 三、基于微观基础强化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苏南实例的关键并不在于产业结构失衡与调整的本身,而在于微观基础与苏南相当或比苏南更差的广大地区怎样进行切实可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它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在微观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2)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有效路径是什么;(3)基于微观基础强化的逻辑顺序应该是怎样的等。笔者认为:

1. 不以微观基础强化作为前提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难以持久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种有序的经济运动现象,其基本实现方式包括按需求平稳顺序进行与不按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配置两种。后工业化国家为尽快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希望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超前配置产业或进行非均衡的产业高级化,并涌现出了以日本、韩国为基本代表的成功范例。A·格申克龙认为一些在先进国家工业化中的前提,在落后国家根本找不到或在很低程度上存在;尽管经济落后国家没有这个前提,工业发展的“暴涨”阶段仍会出现。为此,一些已经被肯定了的前提条件,在不同条件的工业化过程中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找出一系列替代这些不存在的“前提”的措施(罗斯托,1988)。笔者认为后工业化国家可以在缺乏有关前提性条件的情况下,实行“暴涨”型工业发展,但要在暴涨的可持续性取得突破,就必须在弥补前提性缺乏的有关措施,如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与企业机制的日益健全等上下功夫。人们在谈论日本成功地进行赶超型产业结构调整时,往往只注重政府所实行的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而忽略了使这些战略与政策得以良好实施的企业素质。正是这种优良的企业素质避免了因政策干预而经常产生的“腐败、低效率及不负责任”之类的弊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策之所以总是得不到成功,也正是由于实际上存在着上述弊端(饭田经夫等,1987)。也正是上述弊端,使苏南的高速推进战略因波动剧烈、效益不佳、结构失衡而中断,使外向型带动战略难以收到预期的带动效果,并因内资企业衰落而最终阻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为此,各地在制订“十五规划”与确定重点发展战略时可以直接瞄准最前沿的高新产业,但必须充分考虑与这些前沿产业要求相对应的基础条件与潜在优势。当前,中国很多大中城

市在制订“十五规划”确定重点产业时都把微电子等高精尖产品作为首选项目,它极可能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而埋下新一轮的结构失衡的隐患,更可能因为企业机制不灵、人员素质不高、配套集成能力欠缺而只剩下高新技术的“外壳”。

2. 不以微观基础强化与利用作为前提的结构合理化是低效的。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中,发明家、企业家与政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明家创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企业家直接利用发明促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则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上虽有需求,但由于技术创新时间长、投资风险大而使技术进步难以实现的不足。但直接促成发明家、企业家与政府作用发挥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内生力量来实现的。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是改善产业结构性能,增强产业结构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能力。其基本任务有二:一是通过企业改制等提高产业的素质与市场适应性;二是健全产业间要素流动机制,解决资产凝固化和产业关联被割裂的问题(周振华,1992)。如果产业结构缺乏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能力,缺乏相当的弹性和适应性,那么单靠外生变量的输入是难以实现各产业间非均衡协调的。苏南实例中长期得不到有效协调的产业结构在企业广泛改制后得到迅速改观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企业改制仅仅是完善微观基础的一个内容,但在“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而严重的情况下,它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这一问题的对策很多,许多专家、学者也对此作了不少探索,但笔者认为,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基本假定——“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愿意并有能力约束代理人,以防止所有权益流失”(王红领,2000)不完全成立的情况下,从“三个有利于”角度出发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迅速进行以公有股转让为其基本内容的企业改制。因为它有助于强化企业产权的主体意识,促使广大员工,尤其是企业家更多地分享企业剩余或所有权权益,促进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作用的发挥,并弱化企业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负影响。另外,政府在确定所在地区的产业发展序列与调控措施时,应充分考虑由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与政治经济状况等决定的微观基础与区域特点。苏南吴江市横扇镇羊毛衫产业与邻近吴江、苏州的关系并不大,相反受私营经济内在同质性影响,与浙江的技术、资金、人员等方面的联系却非常紧密,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如果横扇镇政府不是采取以“无为”为其基本特点的疏导性措施,而是像很多地方那样“拉郎配”或刻意扶持一个与羊毛衫没有关联的其他支柱产业,那么就不可能使既不养羊,也没有工业基础的小地方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1999年,羊毛衫产业直接给横扇带来10亿多元的销售额、1亿元的利润以及近1/3的财政收入来源,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据此笔者认为不以微观基础强化与利用作为前提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低效的,要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在强化微观基础上下功夫。

3. 强化微观基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内容。从苏南实例中,可以看出企业改制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结构调整则因农户衰落而难以收到如期的效果。为此强化微观基础就成了三次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内容。强化微观基础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文中提到的企业改制外,还包括:通过鼓励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兼并、合并或组建企业集团,使部分存在过度竞争的产业实现资产存量重组;参照国际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陆续制定、施行与完善重要产品的最低规模经济标准;鼓励规模效益不明显产业中的中小企业

发展,并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完善市场环境,健全中介服务组织等。对农业来讲,则主要通过生产组织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已有一定基础各类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农村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就出现了由一些农村能人带动组建的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并呈现出了从单纯种养业的技术互助到整个生产领域的合作;从合作组织内部生产要素的横向联合发展到产供销各个环节的纵向联合;由经营合作向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资本合作(股份合作制)过渡等趋势。但由于现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所造成生产领域的产业链脱节、流通领域的利益脱节与信息脱节,以及不利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分割与土地制度,终使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得到迅速发展与完善。因此强化农业微观基础的关键内容,是改变目前按产品种设立农业管理部门的过度细分化做法,实行由一个主管部门对农业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把各类以专业技术服务为主的事业机构和各种流通服务组织从现行政府部门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离出来,与现有的农民中介组织一起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化中介服务机构,为农民提供周到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恢复农村供销社、信用合作社和基层粮管所的民间本色,以使农民具有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销售渠道与信贷渠道;将集体经济组织现有的净资产以股权的形式量化给原社区范围内每一位成员,鼓励引导农民以土地使用经营权折价入股,组建以股权为基本纽带的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公社化以前较为有效的农业微观经营形式。因此,通过改革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是中国50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与世界农业接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最具创新意义的组织变革,也将从机制上确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进行

与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推动。

#### 注释:

产业素质的基础是企业素质,但又不是各企业素质的简单加总,而是产业活动质量和水平的综合反映。

该资料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何光耀副主任提供。

多年来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私营企业往往被打入“另册”。然而许多基层干部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采取变通的办法,给私营企业挂上集体的牌子,让他们享受集体企业的待遇。私营企业也乐于戴上这种“红帽子”在“集体”的保护伞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主要指统一作物布局,统一育种供秧,统一机耕作业,统一水浆管理,统一防病治虫和统一肥药供应等。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南集体经济因乡镇企业转制而发生来源危机,着眼于为农户服务的“统”因小农机、小水利产权转移而大为萎缩。

职工作为企业收入的创造者,应该参与企业的评价并享有其劳动成果;职工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具有成为企业所有者的强烈欲望;职工作为经济公平与民主的一份子,人人都应拥有自己劳动成果和自我管理活动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大卫·艾勒曼,1998)。

#### 参考文献:

1.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19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 饭田经夫等:《现代日本经济史》,中文版,512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3. 王红领:《委托人“政府化”与“非政府化”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0(7)。
4. 大卫·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 周海乐:《苏锡常发展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6. 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 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经济学院 南京 210098  
南京经济学院 南京 210003)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113页)既解决就业问题,也获得较好的比较利益。

特别是中国的农业,一方面决不能再以中国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等为由不去寻求、采用,甚至拒绝、抵牾现代化的非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那样,在中国面对加入WTO的形势下,在世界用高效率方式生产的低价值的农产品冲击面前,中国农民不但增收、改善生活不可能,就是目前这种传统方式下的就业乃至生活水准也都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农业必须大力革除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大胆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科技,采用非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只有这样中国农业才可能提高效率,农产品价值才可能下降,并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中与它国农产品相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农业也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也仍可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上发挥优势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但这里所指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是如前所讲的、真正仍可用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作业的农业。

至于中国农业是否已具备了用机械替代劳动力的资金、技术条件,一家一户的土地使用权对机械化替代劳动力的制约如何解除,机械化替代劳动力后的农民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机械化替代劳动力后是否真的会导致全国总就业机会的减少,还是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则不属此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特别是要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促使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都必须首先解决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变革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大量采用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但这往往又会受到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只能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乃至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这种陈见的束缚。由此可

见,本文的新定位及相应的路向选择,就理清了上述问题的源头,对解决上述问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三大经济新环境的作用,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资本短缺、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中国只有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发展一批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使其具有一定的规模,获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既在高科技尖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也有效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人口就业压力大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王冰、辜胜阻主编:《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 刘嗣明:《中观发展战略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3. 周天勇:《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4. 刘嗣明:《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
5. 刘嗣明:《关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几点基本认识》,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9(7)。
6. 邓大才:《试论农村产业组织的变迁轨迹及其选择与创新》,载《经济评论》,2000(2)。
7. 刘振彪:《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国际化》,载《经济评论》,2000(6)。
8. 唐国增:《“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载《经济评论》,200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陈永清)